

《热河日记》中反映的清代民族政策

廉 松心*

摘要: 18世纪朝鲜使臣朴趾源的燕行录——《热河日记》是一部关于中国情况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详实地记录了当时清朝统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宗教等各方面情况,反映了当时清朝的民族政策,对清代社会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热河日记; 康乾盛世; 民族政策

在朝鲜使臣留下的众多“燕行”记录中,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实学家、“北学派”代表人物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最具代表性。这是一部关于中国情况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以细密周到的观察力和博学多识,生动、详实地记录了当时清朝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宗教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好多内容是中国史书中欠缺的珍贵资料,对清代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国内外学界关于《热河日记》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与本课题相关的内容。如韩国金明昊的,《热河日记》研究[1],闵斗基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2],还有山东大学陈尚胜的《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等书的有关章节中,均有所涉猜到了关于朴趾源对清朝民族政策的观点。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相关的文献资料,探讨康乾盛世时期清朝对中原的汉族及蒙藏地区诸民族所实行的统制政策,以充实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

一、对汉族的统制政策

康乾盛世(1684-1799)的中国,对外,经过数十次的征战,空前地扩张了领土版图,实现了大一统局面及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对内,随着工商业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大规模的文化事业,在学术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朴趾源认为,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虽然存在文字狱、禁书等苛政,但仍然不愧为当时世界上繁荣昌盛的最大强国。他指出,清朝入主中原统治全国后一百多年战乱被平息,全境实现太平盛世,特别是千古战场——长城附近的古北口一带,如今已成为“桑麻苑然、鸡狗四达”的和平地带。[4] (P639)而康雍乾盛世的繁荣和稳定是以清朝统治者对广大的汉族及蒙藏地区实行巧妙的统制政策的结果。他认为清朝对汉族的统制政策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尊崇朱子学对汉族士大夫进行思想统制。

朴趾源认为,清朝代替明朝掌握全国政权后,为了确立夷族王朝的名分和正统地

*作者简介: 廉松心 (1964-), 女, 朝鲜族, 吉林长白县人, 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法学博士。

位，主动以朱子学为正统思想加以尊崇，同时通过举行征集图书、编纂《四库全书》等事业，统制广大汉族士大夫的思想及言论。他在日记中指出：“及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则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所谓陆氏之学，几乎绝矣。呜呼！彼岂识朱子之学而得其正也。抑以天子之尊，阳浮慕之，此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何以知其然也，朱子尊中国而攘夷狄则，皇帝尝著论而斥宋高宗不识春秋之义，讨秦桧主和之罪，朱子集注群书，则皇帝集天下之士，征海内之书，为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率天下而倡之曰：此紫阳之绪言，而考亭之遗旨也。其所以动尊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协，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或曰清人既尊尚中土之仪文，而不免满洲之旧俗何也，曰此足以见其情也。”[4] (p650)

朴趾源认为，清朝推崇朱子学是为了怀柔中原士大夫，阻止朱子学真正发展的一种策术，而中原士大夫最终会识破清统治者的别有用心，走上反朱子学的方向。就是说，清朝之所以尊崇朱子学是为了迎合大势，是因为他们察觉到朱子学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同时为了克服朱子学的名分正统论（华夷有别思想），主动以朱子学为正统思想，企图使自己从夷狄的范围里排除。当时在中国学界出现的反朱子学的批判潮流，实际就是对当时朱子学被清朝御用为官学的反叛。“故中土之士往往驳朱而不少顾惮，如毛奇龄者，或有谓之朱子之忠臣，或又谓之有卫道之功，或有谓之恩家作怨，此等皆足以见其微意也。朱子之道如日中天，四方万国咸所瞻睹，皇帝私尊何累朱子，而中州之士如此其耻之者，盖有所激于阳尊而为御世之资耳。故时借一二集注之误，以泄百年烦冤之气，则可征今之驳朱者，果异乎昔之为陆耳。”[4] (p651)作为清朝尊崇朱子学的相关事例，朴趾源在日记中多次指出了清朝皇帝对忠孝思想的宣扬。如乾隆皇帝对明朝的忠臣进行表彰，对奸臣（实际对清朝的建国有功的）进行剖棺斩尸 [6] (p572)，还有对中原的孝子和长寿老人进行奖励或给予特别的招待等做法，[6] (p544)就是为了标榜朱子学的忠孝思想而采取的措施。

第二，举行大规模的编纂事业，抵制汉族士大夫的反清思想。

《四库全书》的编纂事业是乾隆朝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所以引起了朴趾源的格外关注。朴趾源出使到中国的时间是 1780 年（乾隆 45 年），正值《四库全书》编纂事业接近尾声之时。（《四库全书》编纂事业始于 1772 年，文渊阁版于 1782 年完成，3458 种 79224 卷。）他不单纯地认为清朝大规模的图书编纂事业是右文政策的产物，而无论是康熙朝时期的《古今图书集成》，还是乾隆朝时期的《四库全书》编纂事业，虽然都是以继承朱子集注群书的遗志为名举行的大规模的编纂事业，但实际上不过是模仿了明朝为了统制士大夫而举行《永乐大典》编纂事业的政策而已。他进一步指出，清朝通过大规模的图书编纂事业，一方面使汉族士大夫专注于校勘古今图书的庞大工程中，借此削弱他们的反清意识；另一方面凭借收集图书（购书）的机会，检索出不利于清朝统治的禁书。事实上，从 1774 年（乾隆三十九年）到 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长达

十九年的禁书活动中，禁毁书籍达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部以上。[5](P74) 因此，朴趾源将清朝的图书编纂事业比喻成秦始皇时期恶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姑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其豪杰敢怒而不敢言曰其鄙俚，因时义而为身利，一以隐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非秦之坑杀，而干没于校讎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之局(乾隆以四库全书版名之曰聚珍版)。呜呼!其愚天下之术，可为巧且深矣。所谓购书之祸，深于焚书者，正指此也。”[4](p650~651)

朴趾源还指出，因为明末清初兴起的经世致用学对现实的批判和反省，容易引起反清倾向，所以清朝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校讎之役)的方策来阻止经世致用学的发展。事实上，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学主要针对朱子学缺乏对应现实的能力而兴起的。但是，就因为清朝为了统治需要，极力尊崇朱子学，进行严密的思想统制，所以经世致用学无法得到发展，只有其中的经学史学派随朝廷校讎事业的发展而兴旺起来。

朴趾源对清代举行的大规模的图书编纂事业，不单纯地理解为文化繁荣的标志，而与当时清朝对思想学术进行统制的政治意图联系起来考察，这对于一位仅仅停留中国两个多月的外国文人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且超卓的历史洞察力，对今天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举行“南巡”羁縻笼络汉族士大夫。

朴趾源认为，康乾盛世清朝的统治，从表面上看“满汉一体化”的政策很成功，但其背后却仍然潜伏着中原的汉族对北方夷族统治的抵抗。他在日记中多处记述了汉族士大夫们表露出的反清情绪。如在热河认识的江苏出身的汉族士大夫王鹤汀说，汉族女性固守缠足习俗是对满清胡俗的反抗，[4](p623)还有在他的朋友中有不少虽然学识杰出却拒绝出仕，而以商人身份隐居者；从满人按察使奇丰额与前大理寺卿汉人尹嘉铨之间的敌对关系中看出的满汉官员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与冲突；[6](p543)笔帖式及序班等汉人下级官吏们制造清朝统治不稳定的流言蜚语给朝鲜使臣，发泄对清统治的不满情绪[6](p619)……等等。

朴趾源在日记中指出，康熙、乾隆皇帝屡次举行“南巡”，就是为了羁縻笼络汉族士大夫，防止他们反清思想和行动的发生。即“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4](p650)事实上，康熙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乾隆法祖，同样南巡六次。乾隆在《南巡记》中把“南巡”与“西师”并列视为一生所作的两件大事，可见其意义重大。“南”特指江浙两省。那么，南巡为什么限于江浙呢？其原因有如下两点：

一是康熙和乾隆认为，要确立对汉族的统治，关键在于能否使江浙地区的汉人，特别是那里的汉族士大夫稳定帖服下来。因为江浙当时是华夏文化的荟萃之所，对全国的安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最早在黄河流域，但经过晋末永嘉之乱、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及金朝武力征服北半个中国等战乱，经济中心渐渐南移到江浙等江南地区，随着衣冠士人举族纷纷南渡，自然也把华夏传统文化带到了那里，文人们在优裕的物质生活滋养下，更把华夏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峰，明清

进士、高官多南产，就是具有说服力的例证，连乾隆也承认江浙是“人文渊薮”之所在，所以，《四库全书》总共修了7部，按乾隆的指示，有三部放在江浙，供那里的文人就近浏览。

二是康雍乾三位皇帝对江浙汉族士大夫的猜忌防范之用心最深。一方面，清初征服江南时制造了诸多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惨绝人寰的屠城事件，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汉族人民世代难平的民族敌忾情绪；另一方面，则在汉人“华夷之别”畛域太深，清朝入主中原，满族人当上皇帝后“中原陆沉”、“日月无光”、“夷狄盗窃天位”等观念在华夏文化的正统江浙地区尤其强烈，牢不可破。在“士为四民之首”的古代，华夏文化正统所在的江浙士人领袖对清廷的态度可是关乎整个汉族人心向背、清朝治乱安危的头等大事。所以，康熙、乾隆的六下江南虽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关切民生的善良愿望，但主要还是基于清醒的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千方百计想怎样才能把那里的汉族老百姓、士人，尤其是那些精英人物安抚好。为此，他们祖孙俩特地在明太祖孝陵前三跪九叩，频频接见声望风著的江南耆老宿儒，风尘仆仆跑到各处阅视河工海塘，还做出豁免江南（包括江苏和安徽）、浙江民间田赋积欠以及赐举人、增学额等羁縻笼络的举措。

二、对蒙藏地区的统制政策

朴趾源在日记中，不仅记述了清朝对中原汉族的统制政策，而且还指出了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地区的稳定而采取的策略。他在前往热河的路上，目睹了为了庆祝乾隆皇帝的万寿节，无数的进贡车辆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到达热河行宫的情景，“渐进热河，四方贡献辐辏并集，车马橐驼昼夜不绝，殷殷轰轰，势如风雨”[4](p616) 其中，包括了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各族王公的朝觐团。这充分说明，清朝对中原及边疆诸民族所具有的强有力的影响力。朝鲜使臣在热河停留了六天，住在太学馆里。朴趾源在热河期间，广结朋友，其中，既有满汉士大夫，也有蒙古、维吾尔王公等。通过相互间坦诚的交流及所见所闻，加深了对清朝的认识，体会到了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地区的稳定而对蒙古、西藏等地所费的一片苦心。

第一，借避暑之名，防备蒙古的南下。

朴趾源认为，蒙古族不是单纯的骑射民族，不仅兵马强壮，而且其文化程度也不差于满族统治者，是清朝第一个潜在的敌对势力。中国目前之所以安然无事，是因为蒙古四十八部酋长各拥王号，莫相臣属，势均力敌，未敢先动。[6](P541) 而“盖满洲虽蕃息不能半天下，其入中原已百余年，所以胞养水土，培习风气，无异汉人。清汰粹雅已自文弱，顾今天下之势，所畏者恒在蒙古，而不在于他胡何也，其强狂莫如西蕃回子，而无典章文物，可与中原相抗也。独蒙古壤地相接，不百里而近，自匈奴突厥，沿至契丹，皆大国之余也。自卫律中行说，已为逋逃之渊薮，况其典章文物，犹存故元之遗风乎，兼以士马强壮，固自沙漠之本俗，则天下纲维一弛，呼吸乍急，其四十八部之王，亦安得徒拥控弦，驰逐孤兔于塞下而已。”[6](p541)

朴趾源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热河乃长城外荒僻之地也，天子何苦而居此塞裔荒僻之地乎，名为避暑而其实天子身自备边，然则蒙古之强可知也”[6](p531)就是说，清朝历代皇帝驻跸热河“名为避暑，而其实天子身自备边”，是为了防备蒙古族的对策。“热河之地势，盖天下之脑也，皇帝之迤北也，是无他，压脑而坐，扼蒙古之咽喉而已矣，否者蒙古已日出而摇辽东矣。辽东一摇则天下之左臂断矣，而河湟天下之右臂也，不可以独运则吾所见西番诸戎，始出而窥陇陕矣。”[6](p541)就因为“天下之患常在北虏则，迨其宾服，自康熙时筑宫于热河，宿留蒙古之重兵，不烦中国而以胡备胡，如此则兵费省而边防壮，今皇帝身自统驭而居守之矣。”[4](p650)他还认为“大抵天子近北居住，数出巡猎，则诸胡虏不敢南下放牧。故天子往还常以草之青枯为期，所以名避暑者，此也。……诸臣常得驰马奏事，视漠北如门庭，身不离鞍，此圣人安不忘危之意云。”[4](p608)

朴趾源的上述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康乾盛世时期对边疆政策的特点之一就是“分而治之”。康熙、雍正、乾隆等采取的策略是既要利用蒙古的军事力量维护清朝统治，又要削弱蒙古的地方势力。康熙提出“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7](p677)同时又针对“蒙古人的弱点提出蒙古人欲各自为札萨克，不相统属。朕意伊等各自管辖，愈善。”也就是说，利用蒙古部各自不相统属的矛盾，进行“分而治之”，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蒙古部联合起来形成对清朝统治的威胁。

朴趾源所指出的热河地理位置对控制蒙古势力的重要性，以及清朝对蒙古族采取的因地制宜、“以胡制胡”的巧妙策略等观点，是在中国文献中难以发现的卓见。作为生活在当世之外国人，能够做出如此精辟的论断，真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

第二，利用藏传佛教来控制蒙藏地区。

朝鲜使臣于八月十日到达热河，是日谒见皇帝后，直接到扎什伦布见了班禅额尔德尼。朝鲜使团到热河是为了庆贺乾隆皇帝的万寿节，并不是为谒见班禅。他们在热河能够见到班禅喇嘛，是偶然的历史事件，是因为皇帝的命令被迫参加接见的。乾隆皇帝令朝鲜使臣到热河谒见班禅额尔德尼，也是为了扩大班禅额尔德尼政治、宗教影响的策略。

朴趾源在热河看到清朝皇帝为遏制蒙古，安抚西藏，扶持和利用喇嘛教的种种苦心后指出，清朝皇帝以极高的礼仪优待班禅及喇嘛，是想通过藏传佛教来统治蒙藏地区的策略。“西蕃强悍而甚畏黄教则，皇帝循其俗而躬自崇奉，迎其法师，盛饰宫室以悦其心，分封名王以析其势，此清人所以制四方之术也。”[4](p650)皇帝迎西番僧王为师，建黄金殿以居其王，天子何苦而为此非常奢侈之礼乎，名为待师而其实囚之金殿之中，以祈一日之无事，然则西番之尤强于蒙古可知也，此二者皇帝之心已苦矣。“[6](p530)

清代青藏高原、大漠南北和天山北路的蒙藏民族大多信奉藏传佛教。崇奉藏传佛教不仅关系到西藏地区的安定，而且对稳定蒙古、青海等地区的政治局势有极大的关

系。在蒙古民族聚居的地区，蒙古王公贵族和一般牧民无不虔诚地信奉藏传佛教。自17世纪末开始，准噶尔部就经常利用藏传佛教的影响，联络蒙古部众与清朝对抗。清王朝也看到佛教势力巨大的客观事实，使其无法加以禁止，只有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即扶持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派，削除边疆地区出现的割据势力，达到统一边疆的目的。乾隆皇帝在《御制喇嘛说》中曾这样分析藏传佛教与蒙藏民族的关系“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要实现全国的安定，就必须确保蒙古地区的安定；要确保蒙古地区的安定，就必须利用藏传佛教；要利用藏传佛教，就不能不重视西藏问题，而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用藏传佛教，崇奉藏传佛教不仅可以绥服西藏，而且可以加强蒙古对清王朝的向心力。为此，清朝统治者不仅对蒙藏地区推行优待藏传佛教上层首领，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赋予藏传佛教寺院集团种种特权，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创立金瓶掣签转世制度等政策，还邀请喇嘛和班禅等宗教领袖来朝廷访问，以特殊的礼仪招待。

在清代班禅喇嘛访问中原的事例只有两次。在顺治九年(1652)达赖五世，应邀赴京朝觐顺治帝，是达赖第一次访问事件。1780年7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来热河参加乾隆皇帝的万寿节，是第二次访问事件。为了迎接六世班禅，清廷在热河避暑山庄模仿扎什伦布寺，建了豪华的须弥福寿庙，耗资巨大。六世班禅于1779年六月十七日从后藏出发远涉二万里，历时一年多，于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到达热河。乾隆皇帝提前到达热河，亲自指点备办，接见班禅额尔德尼一行。

借助喇嘛教的力量和影响巩固蒙藏地区的统治是清廷奉行的重要政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两大宗教领袖，深受蒙藏地区的信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八世达赖喇嘛年纪尚轻，涉世未深，而身为八世达赖喇嘛师傅的六世班禅，拥有很高的威望，因此邀请六世班禅来京，是乾隆帝的最佳选择。这样不仅可以借朝觐扩大班禅的政治、宗教影响，还可以通过朝觐达到稳定蒙藏地区局势的目的。

结论：

以上通过朝鲜使臣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及中国相关的文献资料，探讨了康乾盛世时期清朝的民族政策。朴趾源以超卓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指出了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中原的汉族及边疆的少数民族所实行的不同的统制政策。他对清朝民族政策的观点，虽然对今天的历史学家，尤其是中国的学者来看，不足为奇的，但作为生活在18世纪的朝鲜学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见解。《热河日记》对清代中国社会发展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 [1] 金明昊.热河日记研究[M].汉城:创作与批评社, 1996.
- [2] 闵門基.中国近代史研究[M].汉城:一潮阁, 1977.
- [3] 陈尚胜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 [4] 朴趾源.热河日记上[M].汉城:民族文化促进会, 1982.
- [5] 黄爱萍.四库全书纂修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 [6] 朴趾源.热河日记下[M].汉城:民族文化促进会, 1982.
- [7]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Rehe Journal》 and the Study on the Qing Dynasty's Ethnical Policy
Lian Songxin

Abstract: The Piao Zhiyuan's 《Rehe Journal》 of Korean envoy in the 18th century is one of the encyclopedia masterpiece about Chinese situation, which detailedly records the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s, nationalities, customs, religions and so on about Chinese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this book also has historical value to the study on the Qing dynasty's history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thesis mainly study on the Qing Dynasty's ethnical policy during the great era of KangQian dynasty based on the 《Rehe Journal》 and relational data.

Keywords: 《Rehe Journal》 the Great Era of Kang Qian Dynasty Ethnical Policy